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RAEL AND REVELATION

以色列与启示

秩序与历史 卷一

Eric Voegelin

[美国]埃里克·沃格林 著 霍伟岸 叶颖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以色列与启示

秩序与历史 卷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秩序与历史. 卷一, 以色列与启示/(美)沃格林(Voegelin, E.)著; 霍伟岸, 叶颖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1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Israel and Revelation (Order and History, Volume I)
ISBN 978-7-5447-1148-7

I. 以… II. ①沃… ②霍… ③叶… III. 以色列—历史—研究
IV. K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3930号

Israel and Revelation by Eric Voegelin
Copyright © 2001 by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 MO 65201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Vantage copyright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3-155 号

书 名 以色列与启示
作 者 [美国]埃里克·沃格林
译 者 霍伟岸 叶 颖
责任编辑 黄 颖
原文出版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24.625
插 页 2
字 数 599千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1148-7
定 价 4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目 录

编者导言 1

序 言 19

致 谢 27

详细目录 29

导论:秩序的符号化 40

第一部分 古代近东的宇宙论秩序 53

第一章 美索不达米亚 58

第二章 阿契明帝国 93

第三章 埃 及 101

第二部分 以色列的历史秩序	179
第四章 以色列与历史	188
第五章 意义的显露	210
第六章 史学著作	225
第三部分 历史与符号的轨迹	271
第七章 从宗族社会到王权统治	276
第八章 为帝国而奋斗	316
第九章 世俗事业的巅峰	361
第十章 以色列世俗生存的终结	434
第四部分 摩西与先知	485
第十一章 申命律法	487
第十二章 摩西	516
第十三章 先知	580
《圣经》文献索引	694
索引	703
译后记	771

编者导言

《以色列与启示》是一套计划中的丛书——《秩序与历史》——的第一卷,《秩序与历史》准备追溯人类社会中的秩序从其在古代近东诸文明中的诞生直到现代时期的发展史。当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著作逐步展开时,他的计划随着《秩序与历史》第四卷《天下时代》(*The Ecumenic Age*)的出现而有所修正。^①不过,尽管他的思想后来有些调整和转变,《以色列与启示》仍然保持了它论证的有效性,而且就其自身而言就是值得研究的。

对沃格林来说,当历史被看作是为了实现真正的秩序而进行的一场斗争时,它就是可理解的;而所谓真正的秩序,是指“一个需要在事件的长河中追溯性地辨察的现实”。以下这个开启了导论的主题则充当了整套丛书的引言:“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作者的任务就是在历史的长流中辨察出人类用以规范他们个人和社会生存(*existence*)之秩序的符号形式。《以色列与启示》考察了带有宇宙一神的秩序核心的

^① Eric Voegelin, *Order and History*, vol. IV, *The Ecumenic Age*, 现收于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此后简称为 CW), vol. 17, 由迈克尔·弗朗兹(Michael Franz)编辑并撰写导言(1974,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

古代近东诸文明,同时也考察了以色列历史的秩序核心。说到秩序,沃格林心中特别想到的是超越的“存在的秩序”(order of being),如果存在的秩序要想得到真正的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生活就必须与它合拍,而且各个时代天资卓越的个人都能够以符号化的方式把存在的秩序清晰地表达和阐述出来。历史这个词包含了历经文明的兴衰、在变动不居的政治条件下人的生存,但是它特有所指的是人的生命沿着一种有意义的方向——政治事件根据这种意义方向或许可以得到理解——的整体¹运动。于是,历史就变成了为了与存在共同体中的搭档合拍而进行的斗争,一场为了发现涉及神与人、社会与世界的真理而进行的斗争:“每个社会都承载着在自身具体境况下创建某种秩序的责任,这种秩序,基于神的或人的目的,将赋予该社会生存的事实以某种意义。”

作为他那个时代最主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沃格林为了回应 20 世纪早期成功地强化了精神失明症和社会“健忘症”的意识形态群众运动,而着手进行他的研究。他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发现真理,即面向包含了个人、社会、历史和存在论维度——这些维度是经由人类在时间长河中的跋涉所留下的“最为分殊化的”经验和符号化表达(symbolizations)而揭示出来的——的实在开放。他的研究将是一个机会去重新发现作为现代危机补救之道的真正秩序:“不是为了满足对于已死的过去的好奇心而进行的探索尝试,而是对于我们现在正生活于其中的秩序结构所进行的探究。”

沃格林是少数几个把以色列的经验囊括进来,作为探究历史中政治秩序的一部分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政治科学看作仅仅关乎实际发生的历史(pragmatic history)。沃格林邀请我们认真思考秩序的形而上来源,而《以色列与启示》呈现了他对以“启示”的符号所表达的以色列政治经验的解释。对他来说,体验到那个与以色列立约的超越的神,与希腊人发现理性生活一起,乃是发生于西方世界的两次伟大的“存在中的飞跃”(leaps in being)之一。本卷把以色列人在古

代文明背景下所实现的存在中的飞跃解析为理解历史秩序的一种贡献。以色列的戏剧集中体现了当以色列试图调和超越秩序的要求与现实生存的要求时,与生存的紧张关系相联系的那些问题,因此变成了例证的戏剧。沃格林研究的要点是要澄清存在的秩序,而它在以色列超越宇宙论生存方式的存在的飞跃中得到了清晰表达。从先知开始,超越世界的神将占据首要位置,而参与世俗的生存则退居次席。符号分析将提供衡量以色列的与众不同之处的关键:“以色列单独具有作为一种内在形式的历史,而其他社会则存在于宇宙论神话的形式之中。”沃格林的雄心在于发展一种将会更为充分地反映人类现实之全景的政治科学。

在导论“秩序的符号化”中,沃格林清晰地展示了他的历史秩序观将在其中展开的概念框架。他把政治秩序看作是参与普遍的存在秩序的一种行为。存在的结构和范围被体验和符号化为神与人,世界与社会,它们构成了基本的存在共同体。对这个领域的探索关注的是这些搭档中的每一个的真正性质,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人类不是观看这个存在共同体的观众,而早已是其中的参与者。就他们的确获得了对意义的理解而言,他们创造了符号来使必然是不可知的存在秩序经由类比已知之物而变得可以理解。这样的符号必定随着人类在知识和经验方面的成长,不可避免地被其他更适合这项任务的符号所修正,甚至取代。

社会一开始就创造了一系列的秩序,这些秩序符号化了与存在的秩序——社会也被视为它的一个部分——相适的真理。对留在历史中的这种“符号轨迹”的考察引导人们发现符号化的历史过程,以及隐藏其下的相应的人类意识过程。为了表达历史中的这种发展,沃格林使用了诸如分殊化(differentiation)、存在中的飞跃以及与存在的合拍(attunement)这样的术语。连续的符号化的努力构成了符号化历史的基

础,沃格林将此描述为从“紧凑的”(compact)^①符号到更为“分殊化的”符号的运动。以这种方式,就能以越来越高的准确程度接近存在的真正秩序。通过他的“符号体系”(symbolism)的概念,他成功地把生存与知识,以及政治结构与存在秩序相合拍联系起来。

参与的经验可以强大到变成对存在共同体的不同搭档之间同质性(consubstantiality)的体验。在它们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而这样一种生存的经验是紧凑性的。仅仅存在一种秩序,它同时是神的、宇宙的、人类学的和政治的。个人把自身体验为无所不包的存在秩序的一部分,他们必须使自己与存在秩序合拍,而这种合拍在宇宙论的神话中获得了清晰的表达。沃格林把这种类型的社会称作“宇宙论的”(cosmological)社会。人类构建用以阐明其生存的符号还延展到了我们一般称之为“启示”(revelation)的领域。《旧约全书》对以色列历史的记述被沃格林看做缺乏紧凑的宇宙论意识,反被一种更为分殊化的历史意识所代替。这种发展是由神的闯入所开启的,后者带来了人类自我意识和理解中的飞跃。

在第一部分,沃格林概括描述了宇宙论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是他的主要模式。它的符号化表达了“社会以神话的方式参与神性存在,而神性存在则安排了宇宙秩序”。有关阿契明帝国的简短一章论述了波斯后来的历史。埃及文化是另一个例子,因为它也是植根于神的秩序与法老秩序的同质性之上的。有时,在埃及漫长的历史中,在孟斐斯神学和埃赫那吞改革中会暗示出现了朝向超越的存在的突破。然而,这种突破从未实质性出现。埃及社会仍然处于神话的符号体系模式所表达的“基本经验”之中。

《以色列与启示》的其余部分论述的是以色列社会的独特性。在第

^① 陈周旺博士在《秩序与历史》卷二中将该词翻译为“浑然一体”。参见《城邦的世界》,第65页,译林出版社,2008年。——编注

二部分阐明了以色列的历史秩序之后,沃格林在第三部分通过研究那些已获得符号意义的实际历史事件,来追溯以色列的例证历史的出现。在第四部分,他通过研究《圣经》中的摩西和先知文献,更加充分地论述了例证的意义。

在出埃及的经验中,以色列经由超越世界的神给予摩西的启示而打破了宇宙论的生存方式。西奈山的立约关系把以色列改造成为居于应许之地的被选民族。根据沃格林的说法,这些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因此可以对其进行经验分析。启示被体验为来自宇宙之外的神的闯入。沃格林的研究正始于这一事件的“存在论现实”以及随后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在神之下的现在的生存。在西奈山所发生的事不
4
仅是以色列历史中的决定性一步,而且也是人类力图实现政治秩序过程中的决定性一步。给摩西的启示和与以色列立约是摩西为以色列,以及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为全人类所采取的代表性行动。在以色列的政治秩序中,沃格林发现了宗教和民族经验中的一种分殊化,其结果是一种并非源自与宇宙节奏合拍的政治秩序。在以色列,历史变成了一种生存方式。以色列通过一种对神的集体性回应行动而造就了自身,并把自己的过去解释为一系列的成功与失败,这些成败根据存在的超越秩序(被启示的)就可以得到理解。历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最早由以色列所创立,所谓生活方式就是说人类认可他们在一个超越的神之下的生存,并且根据对神的意志的遵循或背离来评判他们的行动。

启示在其中得到表达并且在历史中造就了以色列的那种符号形式正是《旧约全书》的例证叙事。由此,历史既在史实的意义上被看作对事件的记录,又在例证的意义被看作是对神之下生活的现在的彰显。实际历史的进程现在被改造成为“圣史”,其中“单个事件则变成此岸世界中神与人相处方式的范例”。人在社会中的生存是历史恰恰是因为它具有一种精神维度,这个精神维度就是与神结伴,朝着神的王国的末世论圆满(eschatological fulfillment)进行历时弥久的运动。虽然沃格林

承认实际历史的重要性,但他主要关注的是作为以色列生存之“内在形式”的历史。以色列生命中的各种事件在传统中留下了一条“符号的轨迹”。后来的历史学家根据圣约秩序以例证的方式强调这些事件,并在史学著作的创作中完成了这项任务。向前回溯历史秩序的符号体系,它超越列位祖先回到人类的早期历史乃至创世本身,以便创造一部世界历史。西奈山之后发生的事件根据对神的意志是遵循还是背离而予以评判,先后经历了部落联盟的社会组织、君主制、帝国、分裂的王国以及先知对被放逐者的接替。这种例证的叙事反过来开始对该民族的生活发挥构成性的作用。通过在宗教崇拜的背景中对其进行回应,后来的世代变成了以色列的成员。

圣约规定了神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正当关系,但却没有规定政府组织,因而提出了关于实际历史与例证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开始,由于世俗生存的压力,新的精神生活就很难维持,而这种压力在君主国期间日益增长。沃格林对自大卫时代以来所采取的“帝国的符号体系”持特别批评的态度,他认为这等同于“重新回到宇宙论文明的地狱”和“从存在中堕落”。他坚持认为,神对人的启示之所以没有达到理想的清晰程度,是因为它过于紧密地跟生活在迦南地、作为神的民族的以色列之实际历史纠缠在一起,他把这样一种局限称为“迦南的约束性义务”。被选民族被组织为一个政治实体,尽管对于生存来说是必要的,但却引发了先知所阐发的一场冲突。由部落联盟到王国和帝国,由内战和分裂的王国再到被放逐的悲惨结局,这一现实层面上的运动为以色列着手表达它的秩序,并阐明它在神的意志下生存的意义提供了战场。这是通过史学著作而得以完成的,但更多地是通过先知的布道而加以实现的。摩西这个人变成了一个中心,历史学家、先知和立法者围绕着他努力把以色列重塑为被选民族。

精神权威现在转变为作为“新的意义承载者”的先知。他们的使命是召唤以色列重新回到圣约的生存方式,但他们的努力大部分毫无效

果。重点从被选民族转到作为神的秩序承载者的先知本人。根据沃格林的说法,先知们的伟大成就是意识到,规定了神之下圣约秩序实质的摩西十诫,其规范形式包含了对灵魂的正当秩序的一种存在论阐释:“在神之下的生存意味着爱、谦卑和行动的正当,而不是行为的合法性,这个洞见是先知们在以色列秩序史中的伟大成就。”这使得耶利米把最初的圣约符号体系分殊化为一种新的符号,即写在心灵上的圣约。由于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背叛,心灵的转变成为必需,但大多数以色列人拒绝转变,被选民族只得由被选个人(the chosen man)所替代:“在耶利米身上,人的个性(human personality)已经打破了集体生存的紧凑性,并且意识到自身就是社会秩序的权威性源泉。”

耶利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下述洞见的表达:先知的生存是与神一同为他的民族而受难,因此这个阶段是为受难的仆人而设定的。在沃格林看来,《旧约全书》的高潮部分是《第二以赛亚书》对受难的仆人——他们代表了广及列国的新共同体——的描绘。随着受难的仆人开启了“以色列从自身的出走”,这是出埃及运动戏剧的最后一幕,这个仆人成了为人类受难的代表。他开展了“从具体社会的秩序向救赎秩序”运动。受难与拯救在一种新的救赎秩序中被联系在一起。正如沃格林所发现的,只有到了现在,在以色列人的经验中得以分殊化的存在的秩序才以其全部的清晰度充分展现出来,“救赎的真理揭示为受难结出的花朵”。神不仅被宣告为以色列的神,而且被宣告为列国的真神,全人类的救世主。该仆人的任务就是通过变身为“人类的救赎之光”,而把神的救赎的好消息传播给世界。以色列明白救赎来自于超越它自身的神的来源。然而,救赎在历史中的完成必须要等待神参与人的受难。

《以色列与启示》是我们获得的对《旧约全书》历史观最为透彻的哲学分析。它立足于运用当时所能获得的最好的解释工具所进行的批判性考察。尽管仍然存在许多需要纠正、澄清和完善的问题,但这些问题

无论如何也不会减损沃格林提出的总体结论。下文将挑选这样一些需要纠正的问题作为例子——无论它们的重要性程度如何——来进行初步的考察。

在《旧约全书》中用来表示神的一个希伯来语词汇是 *elohim*, 这是一个复数名词, 在语法上意味着“诸神”。然而, 到摩西的时代, 它在亚马拿文本和拉斯珊拉文本中开始意味着神的所有显现形式的全体 (J. B. Pritchard 编:《古代近东文本》*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483—490])。这种复数形式也可以用于指称一个单一的主神。于是, 沃格林说“埃洛希姆 (the *Elohim*) 按照他们的形象造人, 使人与他们相像” (原书第 55 页^①) 就是非常误导读者的, 因为希伯来语文本使用了一个单数动词和一个阳性单数后缀 (*besalmo*):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七节)

《申命记》被描述为“对耶和华秩序的显著恢复”, 它规定“要在实际历史的一个具体社会中保存耶和华的秩序”。编者们“已经成功地把神爱之秩序转化成为一种制度模式”。虽然如此, 沃格林却声称神的话语变成了鼓励遵守字面上的法律而不是鼓励心灵服从的《律法书》。它成功地把神之下的现在的历史生存形式冻结为犹太民族的宪法教条。但《申命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教导而不是为了强加行为规范而提供神谕。劝导人们全身心地爱上帝之后就是号召聆听者把这些话牢记心中, 并教导给他们的孩子 (《申命记》第六章第五节至第七节)。申命律法远非沃格林声称的那样是以色列的坟墓, 而是充当了其精神的传送者。作为一部归功于摩西所作的权威性文献, 它宣告西奈圣约与后来的一代人同时存在, 并就以色列应当走什么路提出了引导和指示。同时包含了叙事和命令的申命律法成为人们在重建的后放逐期犹

① 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 以下同。——编注

太教共同体中生活的基础。

在他的《旧约全书》研究中,沃格林忽略了以西结、后放逐期的先知以及这样一种祭司传统——它的符号体系是神在活动圣殿中显现于他的民之中。他仅仅附带论及了《创世记》第一章至第十一章中戏剧般表现了恶的问题,并对天启文献所表述的历史中的绝对恶持负面观点。

沃格林没有思考《旧约全书》著作的一个主要部分,即智慧文献(the wisdom literature),而它恰恰证明了基于创世神学的人类经验中恒常不变的东西。在一个并未从根本上把以色列的启示历史与基本的存在共同体——造物作为其一部分——分割开来的哲学存在论中,这是一个重要的疏漏。以色列更为分殊化地理解历史必然导致更为分殊化地理解生活于超越的神之下的造物。研究智慧文献对于思考以色列是如何通过修正和改造来吸收其邻居的以造物为中心的符号体系来说也是具有相关性的。在《天下时代》中,沃格林称赞智慧书促进了“灵魂意 8 识(pneumatic consciousness)的进一步分殊化”(第99页)。

沃格林未能意识到以色列政治组织的积极方面,因而他也未能完全适当地评判超越的神与以色列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他把国王圣约神学看作一种“出轨”。在他看来,当以色列沦落为大卫和所罗门统治下的宇宙论社会时,决定“像列国一样”拥有一位国王代表了“从存在中的堕落”。这种对以色列君主制的负面评价我们很难感到满意。首先,《旧约全书》的证言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撒母耳记上》第八章至第十二章)。一方面,它赞成王权统治是一种符合神意的发展,然而另一种观点又把它看作神对一个反叛民族的勉强让步。大卫时代对宇宙论符号体系的采纳需要对以色列的传统作新的理解。这种符号体系绝非取代了摩西的符号体系,而是继续与之相互作用,并且丰富了以色列对神与他的民族、社会以及创世本身的关系的理解。

从大卫时代开始,对宫廷的挑战使最初对以色列的经验来说是陌生的两种制度,即王朝式的王权统治和神庙,适应并融入以色列的信仰

观点。这个过程引发了这样的符号体系,即与大卫订立的国王之约(《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以及把锡安山当作神在地上的居所。大卫之约的解释者从以色列之外——特别是埃及——的符号世界中借用素材,但这个符号体系被重新解释和历史化以便适应以色列的信仰观。因此,超越的神变成永远现身于他的民族面前的“与我们同在的神”,通过他所任命的人来实施统治,并且栖身神庙,居住在他们中间。国王和神庙符号化了神对造物的秩序化,而社会秩序反映了宇宙秩序的公正与和平。

沃格林的存在哲学未能充分论述以色列的社会现实。除非在社会领域得到彰显,否则就不可能与超越的神真正合拍。那些与神有关系的人受召来到世界上行事,承担世俗事务的责任,以便正义能够获胜。从出埃及的时代开始,神也积极地涉入社会领域,那时他干预了人类的历史以改变压迫性的社会条件。沃格林如此专注于普遍的存在秩序,以至于他忽视了这个世界上为了实现正义而进行的斗争。这在他对先知的论述中特别明显。虽然强调“灵魂的正当秩序”,但先知们也要求一个基于与神的正当关系的社会秩序。他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先知的民族关怀和社会关怀的中心意义,而且似乎不愿承认他们呼吁社会正义的重要性。

在沃格林看来,先知所传达的神谕体现了一种要恢复摩西最初所订立的约及其遗产的努力,而这约和遗产正岌岌可危。国王和人民都拒绝了立约的神,而去追随假神。对沃格林所说的先知的问题,以赛亚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说明。第一个事件是在亚兰—以法莲战争期间,当耶路撒冷受到以色列—叙利亚联盟的威胁时,以赛亚前去游说犹大王亚哈斯,后者正在考虑在这场危机中寻求亚述人的帮助。经由以赛亚传达的主的话语是这样:“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害怕。”(《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四节)在沃格林看来,这似乎只是说“要相信神”。在第二个例子中,当犹大受到亚述进犯的威胁而想要与埃及结为同盟时,以赛亚劝诫